

演講稿(二)：簡媜談《紅嬰仔》

時間：民國九十一年(2002)九月二十二日

地點：宜蘭縣文化中心

演講人：簡媜

記錄者：許瑞秋

因為身高只比鄧小平高一點，所以我先站著讓大家看我的長相，有必要再坐下來。謝謝小說家廖蕾夫(廖風德)，也謝謝宜蘭喜歡文學的鄉親們，我差不多有十年的時間沒有回宜蘭來參加類似的座談或演講，但是倒是蠻常回自己的家鄉。我是國中畢業就到台北去讀書，但是在宜蘭成長的種種經驗已經內化成我生命中很重要的地基，看到在座的老師，讓我回想起國中的歲月。雖然在宜蘭的時間只有短短幾年，但這塊土地的山光水色，人情物種變成寫作的基礎。我離鄉背井到台北去唸書，雖然當年在順安國中的成績還不錯，但是各位要知道，我是五年級 0 班的學生，民國六十幾年的宜蘭還很封閉，跟都會的交通和交流不夠。鄉下國中畢業的孩子毅然要到台北去唸書，可想而知是多大的抉擇。我記得那時我的老師都有點手忙腳亂，還問我，「你真的要去嗎？」我說：「真的！」那時到台北考高中，是吊車尾考上最後一個公立高中，位在新北投的復興高中。

高中這三年很重要的是把我帶到寫作這條路，為什麼會這樣？最重要的是離鄉背井。從純樸、充滿山光水色的蘭陽平原到都會台北就學、生活，一切全都要靠自己，在這種環境下察覺到自己和周遭人的格格不入。舉個例子，我會暈車，在宜蘭沒有經過汽油的洗禮，鼻腔對空氣的記憶是香的，聞到的是稻香、花香、飯香、甚至是豬糞的味道，但是就是無法接受汽油味。從台北親戚家要坐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到新北投復興高中。沒多久，我的書包就要放塑膠袋、毛巾、酸梅、萬金油，通常撐到士林小北

街時就要下來「抓兔子」〈吐〉，到路邊先解決一下再上車，回來時也是一樣；還有，坐電梯時會暈電梯，電梯門一關，我就有空間憂鬱症；在城市棋盤式的生活中到處迷失。生活上的不便可以漸漸去克服，更重要的是開始感覺到城鄉的不同，城市裡的同學對你這個鄉巴佬的態度完全不懂，你講話的素材是他們不懂的，例如「放暑假了，要趕緊轉來割稻仔！」這種隔閡讓你在班上被孤立了，這種孤立再碰上離鄉背井的青春期，心裡是承受很大的壓力。在這種狀況下只有兩條路可選，一是承認自己失敗了，回宜蘭唸書；第二是克服它。對我來說，可能基於宜蘭人不認輸的骨氣，心想，「我千里迢迢來，怎麼可能敗在汽油味和電梯上？」所以只好咬緊牙關，自我訓練，每次上車就故意選司機旁的位置，習慣汽油味後，不須在小北街下來就地解決，我知道我克服了汽油味。我後來在宜蘭的鄉親朋友身上，看到這塊常常淹水的土地給我們最大的啓示就是「不輕易認輸！」

我必須很感謝土地給我的能量，讓我在異鄉城市中慢慢適應。差不多在高二，我還無法完全融入城市同學的世界。譬如她們常在聊：哪個男生寫字條給她？她又看上哪個男生？假日要去哪裡烤肉？哪裡看電影？她們所講的我完全聽不懂。那麼我怎麼去安排自己的情緒？就是透過紙和筆。我渴望朋友，也想念家鄉，滿腔的鬱悶只好藉著「語言」或「文字」來宣洩。我選擇用筆記錄心情，自己看昨天、上個禮拜的記錄，漸漸的在心態上起了變化，因為文字是理性思維的結果，當你用文字來書寫時，內在已經做過了處理，在養成記錄的習慣後，回頭看自己的紀錄時有一個很重要的獲得就是「客觀和理性」，並看到自己情感上的弱點和生活上的缺憾，心理上的慾求。在高二時，我寫了一篇〈雨的樂章〉投稿到校刊，人在異鄉會想念家鄉的一切，在天氣方面很想念宜蘭的雨，所以寫這篇文章，很幸運被校刊接受，我一個同學是校刊編輯，她說：「簡敏嬪〈我的本名〉你的文章校刊會登出來。」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上天在聆聽我的感覺，那種喜悅是很難形容的。文章登出來後，我得到這輩子第一筆稿費25元。文章登出來是一個很大的鼓勵，開始了解這是一條路，幫自己找到一個出口，

膽子大了就投稿《北市青年》。如果它接受了，就回一封信給你，否則就把稿子退回。如果我有投稿，每天第二節下課就小跑步到訓導處看有沒有我的信，看到厚厚一疊，就知道被退稿；如果是薄薄的，就知道是好消息。所以，到高三的時候，就很確定我這輩子會往哪個方向走，這是很幸運的地方。因為家庭的變故，我父親很早就因車禍過世，也因為這個變故，我決定離鄉背井去更大的都市尋找發展的機會，我覺得我幸運的地方是我的腳踩下去都有腳印出現。很多人雖然也很用心努力，他們很用力把腳踩下去，可是沒看到腳印，或者是腳印很模糊的。

除此之外，我在高三時做了一件難得的事。我剛剛提到我和都市的同學之間有很大的差距，我曾試著去改變這種狀況。所有的狀況，回到自己，就只有兩種選擇：接受它或改變它。接受它的結果是很不愉快，每天進教室都頭低低的，教室吱吱喳喳的，但沒有人來跟你講話，你也不知道要跟誰講話，要講什麼。於是我想，我是不是可以做些改變，我想我應該也可以交到朋友，我也不是很差的人。我害怕和他們交朋友，說不定他們也害怕和我交朋友；我害怕和他們交談，說不定他們也不知道要如何和我交談。我覺得我做了一個蠻好的改變就是放開心胸和同學進行交流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到了高三的時候，我代表我們班去角逐模範生。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因為你必須先贏得你們班同學對你的接納，他們推選我代表班上競選，表示他們對我的期許，也代表我對他們的承諾。我們在高三時找幾個能歌善舞，比較活潑外向的人組了一個競選團。你知道復興高中是男女合校，高中生男女間的感覺是非常詭異的，當你走過男生班的走廊走過時，他們會故意發出討厭的聲音，甚至故意惡作劇。你想在這種狀況下，要踏入男生班的大樓、還要走進男生的教室，再走上講台去拉票，實在是一種酷刑。我記得我們班競選團的成員，平時很會跟老師抬槓，可是爬樓梯的時候說：「我腳都軟了！」我說：「不行，我們現在人都來了，男生都看到我們上樓了，如果現在下樓的話，一定是落荒而逃，這齣戲還唱得下去嗎？」只好硬著頭皮進去。在座有很多男生，你知道青春期的男生有多可惡和討厭嗎？進去之後，男生開始鼓譟、尖叫，開汽

水、吹口哨……，老實講，心裡非常害怕，我們個頭這麼小，快要被一股洪水猛獸淹沒的恐懼。可是就是一股不服輸的精神，讓我意識到即使是一齣最難唱的戲，但是你已經踏上來了就要把戲唱完。也許你沒有辦法決定在唱的過程中別人有沒有給你掌聲？別人是用什麼心態在看你？但是你唯一可以決定的是你要將它唱完，留給自己比較完美的句點，不要留下刪節號，落荒而逃……。那時心裡把所有聲音排除，進了他們的教室，站上他們的講台，開始講「各位同學……」男生也很奇怪，他們本來要用各種招式嚇你，後來發現你不怕時，倒也願意靜下來聽你講話。這個給我很重要的體驗，有時候你怕他，也許他只是虛張聲勢，並無惡意，當你讓他感受到你有誠意去介紹自己，他也不是不能聆聽的。最後，我以全校最高票當選。這是可以跟兩位國中老師分享，你教出來的學生沒有讓你丟臉。

到了要考大學時，我就蠻確定我要讀中文系，而且要走創作這條路。我們當年蠻慘的，對大學一無所知，學校能提供的資訊也非常有限，當時的教育系統是封閉的。當時我們班上一窩蜂都去補習，我當然沒錢去補習，心裡會恐慌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們補習的講義借來看，看不懂就問同學「這一題是怎麼解？」她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？」我說：「你不是下了課就搭公車到補習班去嗎？」她說：「我睡著了！」所以我們班很多人是去補習班睡覺。爲了大學聯考，我是花了一些功夫讀書，這時候就要感謝小時候「做田」，真的對耐力有幫助。我小時候是被阿嬤、爸爸、媽媽拖去割稻，因爲「做田」可以訓練小孩子的耐力，所以到考試前的耐力比別人好，不容易打瞌睡。我很幸運，先考上台大哲學系，後來再轉到中文系，這中間又有一段曲折的故事。

可是到了台大，本來在高中覺得自己的表現還不錯，可是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台大有那麼多比你聰明十倍百倍的人，所以覺得自己要更努力。因爲喜歡寫作，所以課也不去上，專心寫作，那時在學校和外面都有作品發表，我還得了台大第一屆散文獎第二名〈第一名從缺〉，但到了要轉系時，才發現轉系要靠你的國文和英文成績，英文成績普通程度，國文成績因翹課寫文章，所以成績也是低空飛過。既然已經生米

煮成熟飯，真的是無力回天了。後來我的朋友李惠綿建議：「你的文章寫得這麼好，爲何不把你這些文章蒐集影印一份，然後去找系主任談一談？」我就將高中到大學的文章整理一下交給我的同學，同學再交給她的老師，再轉給中文系系主任，當然我寫了一封文情並茂懇求哀求的信。我心裡想，可能無法如願，因爲大一的成績並不算好。我覺得我很幸運，總是碰到開明的、願意聆聽的人。暑假留在台北打工，有一天黃昏回來，看到宿舍信箱躺著一封台大中文系寄來的信，心想：「完蛋了，一定是一封拒絕的信！」可是一打開，哇！看了好感動！信的大意是：歡迎你到中文系來！我心想自己怎能如此幸運！這位系主任就是葉慶炳主任。以前中文系給人的印象就是念一些詩詞歌賦，可是到了葉主任街系主任後，他開始對外開一扇門，大量地跟報社合作，所以我們中文系前後期的學弟妹也有不少人走上創作這條路。這是大學前我文學上簡單的履歷。

文學這條路的滋味我好有一比，有個小故事，有一天老天交給一個人一隻蝸牛，要他帶蝸牛去散步，這個人心裡想：「這不是在跟我開玩笑嗎？」但是這是老天爺給他的差事，他也不能拒絕，只好帶著蝸牛去散步。蝸牛當然是走得慢的動物，一開始他有點急，不斷催促：「你能不能走快一點？」不管他怎麼催促，蝸牛總是慢慢地走，因爲這樣，他有充裕的時間可以坐在石頭上等蝸牛慢慢走來，在等的過程中，他聽到吱吱喳喳的鳥聲，聞到花的香味，因此他發現身旁的樹，也發現石頭後面的花草。我走入文學的路，也有這種感觸，剛開始我只是藉文字來解決自己的情緒，安頓自己的情感，去抒發自己在成長過程中的種種困境，結果整個的發展是反過來，它教會我用文學的眼睛來看待生活，用文學的心靈來體會人世，用文字來記錄週遭重要、珍貴的事情。後來，不是我在寫文學，是文學在寫我。有了這個感悟後，心胸就放大了，剛開始，我們用文字來處理自己的工具，漸漸的，它帶領我們去體察社會、品味人生、洞悉人性，收藏世間珍貴事務的恩賜。從正式提筆到現在，大約有二十五，有四分之一世紀，如果從正式出書算起也有十七年的時間。這些年下來，還不知疲憊，還覺得

有無窮無盡的事情需要去學、去琢磨。雖然我常收到鼓勵，但我覺得一個人在這麼早就被安排走上這條路，而且每一步踩下去都看得到清楚的腳印，這是何等幸運的事。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寫的書的內容，早期我寫的《只緣身在此山中》是跟佛教的義理有關，《月娘照眠牀》是寫宜蘭農村的風土人情，後來我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台北，所以有很多跟都會有關的事，也寫了一些挖掘女性內在世界的書，我寫的《女兒紅》就是比較深入女性的思路、感觸。

後來，我的人生出現比較大的轉彎，就是跑去結婚，這件事害我好幾個朋友要跟我絕交。我一個很要好的朋友叫李惠綿，現在是台大中文系的教授，她出生六個月就得到重度小兒麻痺症，如果她要去上課，全身的配備是十八公斤，兩隻拐杖和背架、鐵鞋，肢體上的障礙和折磨都沒有使她放棄學習，她那種不服輸的精神實在太令人敬佩了。我跟她是大學時認識的，二十多年來感情像姊妹一樣。李教授因為身體上的關係，大學時就告訴我們說這輩子一定不要結婚，我們這群室友中只有我跟她肝膽相照，也說不結婚。我們畢業後，姊妹淘們一見面，我跟李教授就惺惺相惜，那邊都是已經結婚、懷孕或小孩剛出生的，只有我跟李教授是單身的，話題講到一半，那邊已經結婚的就在比尿布、奶粉的價錢，在講哪裡可以買到比較便宜的衣服，還有胎教、學齡前教育等問題，我跟李教授都會嗤之以鼻，如果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碰面還是談奶粉、尿布、鍋子、鏟子的事，那簡直是不能想像的淪落。我跟李教授幾乎是「歃血為盟」，絕對不會踏進婚姻的屠宰場，結婚已經夠恐怖了，還生小孩，更恐怖！這樣過了好多年，雖然情場上多有經歷，但一直沒有走進結婚這條路。到了我三十四歲那一年，我覺得人生到了另一個階段，我思前想後，我確定了我這一輩子是不會結婚的，於是我開始想，人會老，一眨眼間，你可能三十五、四十五……，如果不好好安排，晚景可能會很淒涼。我又是老大，仔細一想，弟弟妹妹們皆非可靠之輩啊。「長女情節」說來話長，講一天一夜都還要流眼淚鼻涕。家中雖有幾分薄田，但也輪不到女生來分祖產。想來想去，不做一點規劃是不行，我就找來保險公司的朋友，為我規

劃一個很重的醫療險。我保險簽字那天是八十四年六月六日，斷腸時，簽完字保險公司的人還算我一朵玫瑰花，這種情景想來有一點悲壯。

一九九五年對我是很特別的一年。我跟我先生是在八月分認識的，我的先生一直在美國〈科羅拉多〉教書，他是那種從小就很會唸書，功課總是名列前茅，讓人很討厭的小孩。但是如果你要他跑一百公尺，他可能會累得不支倒地，是那種四體不勤、五穀不分的小孩。他永遠吃不出你今天給他吃的是高麗菜還是空心菜。他的求學經歷：大同國中、建中、台大電機系，到美國留學、教書，他教書教得好好的，那年七月時向學校請假，回來中研院一年。我當然不會認識他，而是透過台大一個林教授認識的。台大的林教授為何會想到把我們湊成一對呢？因為那年他生病了，我覺得他的病是爲了成全我們！他的病本來醫好了，那年突然復發，這個林教授長我許多〈三十七年次的〉，他結了三次婚，也離了三次婚，一個人在台灣教書，那年他生了一場大病，住在台大醫院，雖然台大給他一等病房，學生也不時來陪伴他，「承歡膝下」，可是學生總會離他而去，他半夜睡不著，覺得自己晚景甚爲淒涼，他不希望其他親友也跟他一樣，所以開始想他周圍的人，尤其是好人，他認爲「好人不應該淒涼」。他一想，在女生方面的好人就是簡嬪，在男生方面的好人就是他，在科羅拉多教書的某人。正巧的是，七月這位在科羅拉多教書的數學家回台灣，林教授打電話給我：「簡嬪啊！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，我們一起吃個飯……」朋友之間吃個飯是常有的事，可是聽得出他電話的怪異，他透露一點口風，言下之意，是要幫我介紹和他認識。我平生最恨相親，覺得「相親」這兩字多尷尬、難爲情，多顯示自己的無能。所以我說：「你要搞這種遊戲，我們也別吃飯。」就回絕他了。我告訴他說：「我基本上比較信任我在馬路上碰到的。」林教授就說：「我會把他設計成你們在馬路上碰到的。」我們常開玩笑，所以也沒把他當一回事。

有一天，林教授打電話來說：「簡嬪，吃個飯吧！」因爲他孤家寡人，所以他邀約吃飯，基本上，本著做好事的想法就陪他吃飯。結果一到餐廳門口，我到，他也到，

而且後面還跟著一個人，我突然立刻醒悟他的詭計。他介紹說：「這是某某某，剛從科羅拉多回來的朋友，這是簡某某！」我當時的反應很沒風度，雖然兩人是在馬路上碰到的，但這跟相親友什麼不一樣呢？因此整個晚上都沒好臉色。而且他們是外省籍，約著去吃麵食，什麼水餃啦、湯包啦、餡餅啦！而我是吃米食長大的，不太能接受這類麵食。所以我當時是非常沒有風度的，雖然不至於說出不得體的話，但當時是不苟言笑的。後來去喝咖啡，喝咖啡時林教授就慫恿這個數學家，要他說一些數學上有趣的事來製造話題。你知道數學家每天最常做的就是，坐下來，對著天花板思考數學方面的問題，和《美麗境界》裡相似，口才不是太流利。他要把數學界有趣的事講出來，基本上聽的人要有一點數學基礎，你知道我們的數學從小就不是令人滿意，所以當他用數學名詞時，我們也只能瞪大眼睛，很禮貌地看著他，完全不知他在講什麼。但我感覺到，他很認真想打破僵局的誠意，我開始有點同情他。當然林教授也要我講一些台灣文壇、文化界、出版界的事情，企圖把氛圍弄得熱絡一點。後來，林教授也熟悉出版業，我們因對某些事務的觀點不一而起了爭執，倒冷落了這個數學家，使我有第二層的愧疚感。結束時，正好我住深坑，他住木柵，我說：「正好我叫一部計程車，我送你回家！」這對他簡直又是另一種打擊，居然是女生要送他回家……

往後的發展當然有些出人意料，到後來我們決定要結婚時，我低調處理，以免掌自己的嘴。但是多年的好友不能不讓她知道，我訂了喜餅，打電話給李惠綿教授，她知道我要請她吃喜餅時，她頓時呆若木雞，接著傳來啜泣聲，她覺得我背叛了她。後來我把喜餅送給她，交代一下我跟我先生認識的始末，她才破涕為笑。婚後一個月，我包了一個咖啡廳，請了一些藝文圈的好朋友，約五、六十個人吃簡單的晚餐，李惠綿在致詞時，大大地數落我，說我大學時答應她老時要去住養老院，又說將來要在牆壁打個洞，互送食物，我這個朋友居然見色忘友，離她而去……。令在場的人印象深刻。

一個人夜路走多了，會碰到一些不可思議的事。我之前斬釘截鐵、信誓旦旦地說，

這輩子一訂不會踏入婚姻，也不會生小孩，後來，丈夫有了，孩子很快也來報到，開始過著「正常」的家庭生活。因為在我阿嬤眼中，我過的都是不正常的生活。她像誦經團一樣天天念著：「你這麼多歲了，不去找一個對象，一天到晚關在深山裡面，也不去找一個較正當的……」雖然我阿嬤、媽媽天天念我，可是等我有一天回家告訴她們我要結婚的消息，她們也瞪大眼睛，很難想像。

結婚前我把他帶回家，因他們的語言不通，他從美國回來，不會講台語，所以我必須居中翻譯，這樣有個好處，你可以加油添醋。譬如說，我跟我媽講：「伊講一定要來看你，是什麼款的老母，把查某囝教養得這麼好！」跟這邊就講說，「我媽媽說你很憨厚、很老實、很靠得住！」做翻譯一定要有這種本事。雙方見面後，我媽就回來宜蘭看日子準備要結婚，這個過程真的非常順利，就好像我求學的過程，雖然有一點波折，但一腳踩下去，都看得到腳印。也因為這樣，我開始去體會一個正常家庭的世界。我跟各位講過，我國中時父親因車禍過世，從此我們家開始分裂，我對家庭運作學習是有缺陷的，在這種狀況下成長的孩子，他心裡有一個結，就是對正常家庭運作是害怕而沒有信心的。在過去的經驗中，我們也聽到太多家庭經營扼殺女性的發展空間，一旦結婚，生兒育女後，女性就無法按照自己的藍圖去規劃實踐，抑制女性的自我實現，因而產生很多不快樂的女性。也許有很多女性能享受經營家庭的幸福，享受兒女在她手中成長茁壯的喜悅，但現代很多女性對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期許，職業婦女要在工作場合與人競爭，一方面又要兼顧家庭的運轉，並照顧小孩。如此，她很可能累得五馬分屍，心力交瘁。如果她付出這麼多心力，卻沒有人看到，沒有人肯定、支持，到一定的階段，也許七年、八年過去了，她可能會爆發，這時週遭的人會覺得很奇怪，認為她是無理取鬧。只不過告訴你，基隆河氾濫是經過長時間的累積，不是突然氾濫。

我自己在進入家庭時，年紀是比較大，又生個小孩來亂我心緒。成爲一個作家，雖然沒有人要求你什麼時候要完成一本書，你還是要保持一個高度的警覺，你不能

停，就像運動員，雖然曾經保持紀錄，但是只要幾個月不練，腳就會抽筋。作家也是隨時要保持寫作、思考的狀態其實是很重要的。文學一定是思考的結果，你要思考，你的心性要收束在一個焦點清楚的思考，當家裡有個哇哇叫的嬰兒時，如何去思考呢？一方面我感受到自我成長的壓力，一方面又感受到三十五歲才去帶小孩的折磨。小孩就是蠻族入侵，每個小孩都是野蠻人對文明的破壞和挑戰，當兩歲的孩子手一揮將你從法國買回來的花瓶弄破了，你第一個反應是他有沒有受傷，再來才想到自己心愛的珍愛的花瓶破了。孩子會改變你很多的思考、價值觀念，甚至是生活的步驟。

針對這本書，除了剛剛提的生活轉變、體悟之外，另外，我還想跟各位分享。第一是，家庭的經營，夫妻倆必須攜手同心，互相做對方背後最大的支援。我跟我的先生都是年紀很大才學會做父母，生小孩是本能，但對小孩的呵護、養育是必須學習，但社會上很少提供這類支援。我自己碰到問題會去找資料、找書籍，但這方面蠻欠缺的，這是日後可以努力的方向。第二，因為我自己當了母親，對我的阿嬤、媽媽尊敬起來。她們那個年代大約都生五、六個以上，她們一生的精神和青春歲月都耗在養兒育女身上，她們怎麼去呵護、教養，怎麼去訓練，都是一門學問，其中有很多的智慧。她們養育學就像哈利波特的魔法學校，有時帶著很神祕的學問。譬如：小孩晚上哇哇哭不睡覺，我媽就會教我晾衣服的時候，把「衫仔」顛倒一下。以現在的眼光來看，有點無稽之談，可是我會從中感受到女性對待事務細膩美好的部分，另一方面也是女性治療自己孤獨的部分，是女性的自我安慰，因為育兒的漫漫長路，是要她們獨自去承受。因為身為母親，我開始有興趣去紀錄老一輩的育兒智慧。在《紅嬰仔》中有一部分是我刻意將我的媽媽和阿嬤告訴我當年如何「對付」嬰兒的技巧保留下來，如果這些東西不紀錄下來，等老一輩過世後，這些東西就從生活中消失了。透過文學的筆法紀錄一個社會曾經運轉的模樣、思考的模式、生活的樣貌，這當中就是小小的傳承。我寫的這本書，大概是剛懷孕、或剛生小孩的女性看起來最有感覺，她們簡直是把這本書當教科書來看。寫這本書讓我有機會讓我看到生活的另一面，那一面有很多的艱

難和溫馨，所以，我更能體會我的媽媽和阿嬤的偉大，因此，我在書的扉頁題獻給她們：「她們教我在湯裡放鹽，在愛裡放責任。」寫這本書是要告訴讀者，生活當中應該做何準備，以及人生各個項目的重新調整，才不會像我這樣，在多方的壓力下，胃也壞掉，十二指腸也潰瘍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們從孩子身上重新認識生命的可貴，我覺得生命真的是為別人而存在，我們從嬰兒到孩子到現在，走的都不是一條好走的路，每個人的生命都有一些傷害、困境，當我們承受這麼多的考驗，意義何在？我想就是要獻給其他生命。

現場提問(一)：

你在書上說：「男人不是太懶就是太鈍，要不就是幼稚地驕傲著，總是學不會如何善待女人。最壞的情況是，偏又雄辯滔滔，天底下的道理全都捏在他手裡似地。」我覺得這太以偏蓋全，至少我就不是這種男人。

簡嫻：

從你的談話中就可以發現你是一個細膩的丈夫和爸爸。如果嫂夫人在座的話，請接受我們嫉妒的眼光。男性從小就被教導「有淚不輕彈」，有的是因個性關係，有的是受社會制約，他不會在第一時間在家人、配偶面前表達感情，而是將情感擺在一旁，而女性要求你在情感的對應是及時的。如果一個女性問：「你還愛我嗎？」男性可能說：「唉！累了！問這種蠢問題做什麼？」或不理不睬。男性沒有回答的原因可能是：我對你的愛還須講嗎，我一路走來始終如一。但你沒有直接表達，通常會造成女性感情上的失落，會讓女性像枯萎的花朵一般，慢慢失去某方面的信心和喜悅。所以甜言蜜語是婚姻的必需品。就像佛家所講的口中生花、妙語如珠，一句好的話、安慰的話、體貼的話，可能會激發一個人的信心。

另外，男性面對問題的態度和女性也不一樣。我跟我的先生也曾經經歷過一段溝通的磨合期。我們兩個人的個性不一樣，成長環境、生活背景都不一樣，兩人生活在

一個屋簷下，要對同一個議題進行溝通，當然須經一段磨合期。我在這方面頗有警覺，懂得站在他的立場解讀他的言行，久了之後，就知道怎麼跟他溝通。這方面女性比男性有利，女性切換語調的速度比男性快，她可能一面跟人爭執，一轉頭馬上以和悅的聲音跟另一個人講話。夫妻之間最怕的是不再對話，不對話如何溝通呢？不溝通怎麼產生共識呢？沒有共識如何同心呢？不同心怎能同行呢？

現場提問(二)：

繼《紅嬰仔》之後，妳以文學的筆法介入歷史書寫，請問妳創作的動機是什麼？

簡媜：

你問到一個沉重的問題。人會改變，看事情的角度也會改變。今年三月聯合文學爲我辦了一個新書發表會，除了我在發表會上講創作歷程之外，主持人很幽默地說，我爲了寫這本書，蒐集資料，弄到頭髮都白了。第二天，主要的報紙都在寫簡媜的頭髮都白了。這給我一個需要調適的經驗：一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悶著頭做事情，因爲他認爲這件事是重要的，至於麼別人怎麼看並不重要。對我來講，《天涯海角》這本書有一定的脈絡可尋，它是在《紅嬰仔》出版三年後才寫的。在《紅嬰仔》的後記上我寫著：紀錄孩子生命的誕生和成長。這本書的副題是：一個女人與她的育嬰史。既然是「史」，就有時間的流程和變化，包括事務的改變、心情的改變，感悟的改變。如果把《紅嬰仔》當成一個生命從孕育到生出，到成長的歷史來看，這是我送給孩子的禮物，當孩子有興趣回顧自己的生命時，他會發現媽媽幫他準備的這份禮物。也因爲這樣，我會回到我自身，問我自己是怎麼來的？我也漸漸老了，因此我會從歷史的架構中去找答案和線索，反映在寫作上，就是家族史的處理，一般家族史的處理會追溯到自己的上一代或前三代，基本上約百年左右的歷史。我當時並不打算從這個角度寫，而是將它放在台灣開發的過程這段歷史，是因我當初在追溯自己是從何來的，很關鍵是我的祖先當年冒著生命的危險從福建渡海來台灣，那段歷史也是在座多數人祖

先渡台的歷史。我們都是幸運的人，史料告訴我們：當年來台的人六死三留一回頭，回想祖先渡海來台的意志，那個部分對我來講是感動的，我看到其中的悲壯。〈浪子〉那篇重點不在追溯我的祖先是誰，而是追溯到其中的悲壯。〈朝露〉寫的是抗日的歷史，是我對台灣這塊土地無知的告解。當年跟著《聯合報》到福建漳州訪問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，在逛街時無意發現巷子裡的一塊碑：〈簡大獅蒙難處〉，那塊碑給我很大的撞擊，就是我不了解台灣的歷史，我們從小念了很多歷史，其實和自己的社會，和台灣這塊土地的發展是無甚關連的。這讓我產生一些羞愧，我對簡大獅生平事蹟完全沒有認知，我就是帶著這種愧疚去閱讀台灣的歷史。除了〈浪子〉和〈浮雲〉之外，寫得最多的是抗日的歷史。這個社會雖然充滿不同的聲音和抵觸，我覺得台灣是個得來不易的地方，我身為台灣的子民，面對血淚斑斑的歷史，唯一想到的是要對前行者致敬。除此，還有一部分是和「地理」有關的，其中有一篇叫〈水證據〉，寫河川。我們在宜蘭長大的人從來沒有失去和水的關係，水對我們來講，就像母親一樣，母親的淚水、口水，台灣除了宜蘭等少數地方，其他地方的河川紛紛死亡。寫〈水證據〉這篇文章也帶著默哀的心情，看看我們在追求現代的過程中對土地做了些什麼，後面幾篇是紀錄我認為珍貴的價值，有一篇寫童年，另一篇是寫少女夢想的追求，另一篇是寫給愛情的，那是我乾媽的真實故事，她先生死後在墳前豎個小碑，碑上寫著「愛永不渝，至永恆的一對」。在現在社會中，我看起來是錯亂而敗壞的，可是我把我心中珍藏的價值藉著文學紀錄下來。

現場提問(三) 提問人徐惠隆是簡嬪的國中老師：

我把妳這本書推薦給很多朋友看，美國麥克阿瑟寫了一篇 為子祈禱文，在妳心中，妳的兒子姚遠長大後妳要如何為他祈禱？

簡嬪：

其實徐老師知道我當年根本沒參加過作文比賽，反而對漫畫比較有興趣，留下來

的多是漫畫、演講比賽的獎狀。剛剛徐老師提到我對孩子的期望，有時當我不知怎麼辦時，我會問自己是怎麼長大的？每個生命都有與生帶來的特質，這個特質會讓他靠近不同的路，不用急著在三歲、六歲、十歲時去檢驗。透過回想自己的成長歷程，提醒自己不要陷入這種焦慮。其實我自己真正踏上寫作這條路，也是在高中以後。因為他是個獨生子，首先，我期望他能獨立思考，勇敢選擇，並勇於承擔所選擇的一切，做一個獨立的人。第二，希望他對社會是無害的，不要做危害社會的事，或任意傷害糟蹋別人。如果他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個敬業認真的人，我會更歡喜。至於他要不要揚名立萬、成為富豪、名人？晚上睡覺時，我看他的長相，就知道不太可能。做一個媽媽的願望很簡單，我不希望他做一個頭角崢嶸卻不快樂的人，最後把他的不快樂丟給別人，製造更多不快樂的人。希望他找到一條他喜歡的路，坐在他喜歡的位置上，他能夠 enjoy 他的生活，承擔這條路上所有的困境和挑戰，也能獲得他該得的喜悅，我覺得這樣生命就很美滿了。